

# 文化变迁视野下武术攻防属性的演变进路与现实反思

王永乾<sup>1</sup>, 王国志<sup>1</sup>, 闫民<sup>2</sup>, 韩政<sup>1</sup>

(1.苏州大学 体育学院, 江苏 苏州 215021; 2.山东体育学院 武术学院, 山东 济南 250102)

**摘要:** 运用文献资料法、逻辑分析法及文化变迁研究中的剖面分析法、历史复原法等研究方法, 探讨武术攻防属性演变进路。研究认为武术攻防属性在“天圆地方”“天崩地裂”“开天辟地”3个阶段分别呈现强化、弱化以及隐藏的演变进路。在此基础上, 展开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武术发展的思考, 认为武术发展应该挣脱西方体育束缚, 以中国式现代化思想为理论依据, 确立以我为主的武术发展道路; 坚定文化的自觉、自信、自强和自立, 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创新武术发展模式, 汲取世界各民族体育文化的有益因子。

**关键词:** 民族传统体育; 武术攻防属性; 中国式现代化; 文化变迁

中图分类号: G85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6-7116(2024)04-0032-09

## The evolution approach and realistic reflection on the offensive and defensive attributes of Wushu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change

WANG Yongqian<sup>1</sup>, WANG Guozhi<sup>1</sup>, YAN Min<sup>2</sup>, HAN Zheng<sup>1</sup>

(1.School of Physical Education, Soochow University, Suzhou 215021, China;

2.School of Wushu, Shandong Sport University, Jinan 250102, China)

**Abstract:** Using the methods of literature, logical analysis, and profile analysis and historical recovery in the study of cultural change, to explore the evolution approach of the offensive and defensive attributes for Wushu. It has been believed that the offensive and defensive attributes of Wushu show the evolution approach of strengthening, weakening and hiding in the three stages of "round Heaven and square Earth", "Heaven rends asunder and earth cracks" and "the creation of the world" respectively. On the basis of this, this study starts thinking about the development of Wushu in the process of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and then holds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Wushu should break away from the shackles of western sports, and take Xi Jinping's Chinese modernization thought as the theoretical basis to establish a self-oriented developmental road for Wushu; to firm cultural consciousness, self-confidence, self-reliance and self-reliance, rooted in th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and to innovate developmental model for Wushu, and absorb the beneficial factors from national sports culture in this world.

**Keywords:** traditional national sports; offensive and defensive attributes of Wushu;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cultural change

“搏杀之术”的刻板印象，“旋转跳跃”的艺术形态，“内外兼修”的健身理念，不禁让人发出疑问：究竟什么是武术？李泽厚<sup>[1]</sup>认为：“对于一个事物，应该抓住它的最基本的东西，确定它的历史地位，这样也就了解了它。”而关于武术的“最基本的东西”，刘文武<sup>[2]</sup>则认为：“‘攻防’可以统摄整个武术内容的动作属

性，无论是功法、套路还是格斗，只要属于武术，都具有攻防属性。”随着社会发展、文化变迁，武术衍生出多种表现形式，派生出多元化的社会功能，而这些功能的实现都立足于“身体攻防活动”之上，这种不具备击打特征的“攻防”是“技击”随着人类文明的高度发达而产生的进化和升华，在当下的语境中武术

收稿日期: 2024-01-23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20BTY101)。

作者简介: 王永乾(2000-), 男,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 武术文化与发展。E-mail: wangyongqian2000@163.com 通信作者: 闫民

攻防属性涵盖“技击”,却又不止步于“技击”。另外,一直将“技击”置于武术现代发展的语境中会诱使大众囿于“打”的场域,无法对武术形象展开准确定位,产生对武术的“误读”,从而会割裂武术演进发展的历史、忽视人类进步和文明的进化。

所以,理清武术攻防属性的历史演变更适合展开关于“武术是什么”“武术的演变轨迹”以及“武术未来发展”的探索。

## 1 理论基础与相关概念界定

### 1.1 武术攻防属性的概念界定

武术攻防属性是贯穿武术所有内容的核心属性,但是任何一种表现形式和内容都不足以完整概括武术攻防属性,研究所指的武术攻防属性是囊括武术所有内容和形式在内的攻防属性。另外,“信息网络”“现代军事”“球类运动”以及世界上的其他武技都具备攻防属性,因此有必要对武术攻防属性作出界定。

武术攻防属性与“信息网络”“球类运动”等领域的攻防属性相比,其产生至成熟的过程始终围绕“技击”,更为详细地说是通过身体或手持器械做出“非攻即防”的动作,达到对彼方身体造成伤害或限制行动的目的。而武术攻防属性较之其他武技的攻防属性,虽然目的相似,但“如何攻防”是一项文化事实,武术攻防属性的“技击”蕴含深厚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涵和古代哲学思想。所以,武术攻防属性的产生、发展和成熟的过程是“身体攻防”和“传统文化”交织并进、互相影响的过程。另外,从身体哲学看,人是“身心合一”,身体是“我思故我动”,而“思”则是来自人类以身体为窗口对自然的感受、适应以及超越所产生的知识文化、哲学思想,“身体攻防活动”被放入中国人传统的“思”,所以武术攻防属性中的“身体攻防”与“传统文化”就如同“身心合一”的人,不能二元分离。因此,研究阐述的“武术攻防属性”是以“技击”为支持背景,以“传统文化”为理论支撑,通过身体攻防表现出的一种身体文化。

### 1.2 以文化变迁作为研究理论的介入

武术攻防属性的演变并非一蹴而就,而是随着社会文化环境的变迁呈现出缓慢、局部且持续的特征,很难从时间和空间上用具体的年代、地域作出详细的划分。与此同时,武术攻防属性的演变围绕人的历史需要,取决于人的价值观,“而价值观则处于文化的核心位置”<sup>[3304]</sup>,这为将武术攻防属性的演变置于文化变迁的场域之中展开探索提供合理性依据。

文化变迁泛指文化整体结构及功能的变化<sup>[4]</sup>,而创新为所有文化变迁的基础,研究变迁的学者们通常认

为创新有4个基本变种:长时期的变异、发现、发明、传播和借用<sup>[523]</sup>。武术攻防属性作为一种身体文化,它的产生、发展以及成熟的过程就是以“技击”为主要目的,以传统文化、思想为理论支撑,“身体攻防”进行长时期积累、变异的一个过程。而“坚船利炮”等热武器的传入就影响武术作为“技击术”的发展,从而改变了武术攻防属性的存在特征,这种变迁形式就涉及外来文化的“传播”以及对其的“借用”。

武术从“技击”到“体育”再到“艺术”,已然成为武术发展的事实,为了洞悉事实和现象背后隐藏的诸多问题,从更深层次挖掘武术攻防属性演变的原因和规律,就有必要将文化变迁作为研究理论介入研究之中。

### 1.3 文化变迁阶段划分的理论依据

回眸历史,在中国传统文化孕育下,武术攻防属性以具有“两两相当”击打特征的身体攻防作为主要内容,此时武术攻防属性的变迁主要取决于文化系统内部的“发明”和“发现”,需要以稳定的传统社会文化环境为前提。葛兆光<sup>[6]332-345</sup>认为:“中国古代‘天圆地方’的天与人伦行为、知识体系、政治权力的合法性与合理性统统有关。”在终极依据——“天圆地方”的宇宙观没有崩溃之前,知识和思想世界就没有“意料之外”的突然变化,没有“出乎意料”的惊人断裂,一切都在已有的知识与思想中推衍、绵延与扩张<sup>[791]</sup>。因此,将“天圆地方”作为武术攻防属性变迁的首个阶段。

当西方舶来的新颖事物和相对先进的科学技术打破了中国稳定的传统社会文化环境后,为借用西方文化提供了契机,武术从“暴力行为”的专门工具转向“强种强国”的救国利器。这是由于传统社会文化环境的失衡,正是葛兆光<sup>[6]332-345</sup>提到的:“西方科学技术对传统宇宙观的冲击使中国古代的知识、思想和信仰的合理性依据产生了连锁坍塌,对中国传统社会文化环境的冲击可谓是‘天崩地裂’。”因此,将“天崩地裂”作为武术攻防属性变迁的第2个阶段。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的独立自主使得文化主体性有了依托,此时武术攻防属性的变迁取决于国家的主动选择和发展,国家富强、民族复兴、社会安定以及人民幸福对武术提出了新的时代命题。新中国的成立奠定了知识、思想和信仰的新基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紧密融合,造就社会主义的文化环境,这一空前伟大的事业可称之为“开天辟地”。因此,将“开天辟地”作为武术攻防属性变迁的第3个阶段。

## 2 天圆地方:武术攻防属性的强化

“关于宇宙空间的历史时间的知识,就是

古代思想的基础。对于天象的凝视、观测和体验,形成了古代中国人关于宇宙空间的知识,这些知识给中国思想世界提供的是一种经验与技术上的合理性知识<sup>[17]26</sup>。中国古人以“天圆地方”的宇宙观念作为托起古代社会文化环境的基石,用永恒不变的“天”来作为一切知识、思想和信仰的终极依据。正所谓“天不变,道亦不变”,只要“天圆地方”的观念没有被颠覆,中华传统文化就会以其为原点不断延伸。在这个时期,社会动荡不安,民众饱受军事战争、民间私斗以及外族侵扰的折磨,而武术无疑是保存生命、维护利益的“利器”。所以,“天圆地方”时期,武术攻防属性以技击为主要目的,以传统文化为理论支撑,不断拓展身体攻防的内容,使武术攻防属性得到持续强化。

### 2.1 文化隔离的封闭,造就武术攻防属性强化的环境

武术攻防属性之所以在“天圆地方”阶段被不断强化,得益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深远影响和古代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而传统文化的稳定性及其影响力的权威性,与文化隔离机制息息相关。文化隔离是指“把各民族的文化活动局限在一个自我封闭的环境,导致相互间的隔阂甚至长久地隔绝”<sup>[8]</sup>,由此形成的藩篱造就了武术攻防属性强化的文化环境。

回眸武术攻防属性的强化进程,原始时期和氏族社会的人类为了生存进行的搏杀行为还不具备文化内涵和民族特色,而先秦时期出现区别于军事武艺的人体文化现象,即角力手搏,也有《庄子·说剑》中提到“夫以剑者,示之以虚,开之以利,后之以发,先之以至”<sup>[9]17</sup>,表明此时的武技已经开始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到秦汉时期,出现《剑道》《手搏》等关于“剑术”和“拳法”的专著。两宋时期,在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双重压迫之下,民间习练武术抵御敌人,为“身体攻防”与“传统文化”的紧密融合奠定群众基础。明清时期门派林立,出现各具特色的拳种和冠以拳名的套路,富含中国哲学的武术理论著作相继问世,例如《剑经》<sup>[10]</sup>和《太极拳论》<sup>[11]</sup>中皆提到融合中国哲学的攻防理论,《苕氏武技书》<sup>[12]</sup>和《陈氏太极拳图说》<sup>[13]</sup>的开篇先提及阴阳学说等传统哲学思想,而后才展开武术技法的论述。“明清武术典籍中所蕴涵的传统文化精髓,为武术运动鲜明的文化特色注入了新的营养”<sup>[14]</sup>,使身体攻防脱离野蛮厮杀以及毫无招法的自然反应。

在文化隔离机制造就的传统社会文化环境中,武术攻防属性以“技击”为主要目的,身体攻防的内容被不断扩充,攻防理论从“单薄”到“厚实”,攻防技术从“粗略”到“精致”,武术攻防属性的强化紧密契合着中国传统文化,成了能够“下学而上达”的践履之术<sup>[15]</sup>。

### 2.2 频繁的暴力行为,提供武术攻防属性强化的条件

稳定的传统文化环境是武术攻防属性得以产生、发展和成熟的前提,但使其强化的核心则取决于中国古代社会的现实需要,即暴力行为。“古代中国的暴力行为主要包括事关君主社稷的‘公战’和只受特定社会和个人因素左右的‘私斗’”<sup>[16]11</sup>。

在古代军事战争中,负坚持锐、战马突驰、军阵掩进的场景,闪展腾挪、吞吐开合、起落钻伏的武术几乎派不上用场,但是武术攻防属性强化离不开军事战争的影响。一方面,正如《国语》<sup>[17]200</sup>有言:“于子之属,有拳勇股肱之力秀于出众者,有则告知。有而不以告,谓之蔽贤,其罪五。”国家会选拔招募民间具有“技击”才能的武者为“公战”服务,给予其封官加爵的机会,而优胜劣汰的武举选拔制度刺激了武术攻防属性的强化。另一方面,民间向军事战场输送武者的同时,军事武艺也会为民间武术活动提供实践环境和生存空间。例如,《国语》<sup>[17]13</sup>中提到的“三时务农而一时讲武”,这种“战时为兵,平时为民”的武备制度促进了民间武术与军事武艺的融合,为民间习武之人的技击能力和武术攻防属性提供了强化的必要环境。再者,有些具备军事武艺的将士回到民间,将“大枪”等部分军事武艺的内容作为民间武术功力训练的手段,抑或“脱枪为拳”将手持器械的攻防转变为身体的直接攻防,促进军事武艺与民间武术的融合。

国家公战不仅为武术提供了生存空间以及在战场上厮杀实践凝练的身体攻防知识和思想,使武术攻防属性始终以“技击”为主导,不断汲取传统文化、思想为“身体攻防”提供理论支撑,促进武术攻防属性的强化。

### 2.3 宗法制度的内倾,促进武术攻防属性强化的发展

先民居住地主要位处中原,经济来源依赖农耕,这种地理环境和经济模式形成了稳定的生活结构,造就了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法制度。“血缘宗族不仅仅是一种社会关系的体现,而首先是一种政治组织”<sup>[18]</sup>,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法组织或虚拟血缘关系的准宗法组织都具有外向相斥和内向凝聚的倾向<sup>[16]13-14</sup>。这两种倾向对武术攻防属性的身体攻防内容的纵深拓展,以及身体攻防与传统文化内涵的紧密融合起到重要的作用。

相邻的宗族利益纠纷在所难免,争夺土地、水利、码头甚至风水坟地成为宗族之间暴力行为的导火索<sup>[19]</sup>。所谓“一人习武,可以保身;一家习武,可以强族”<sup>[20]</sup>,宗法和准宗法组织对武术技击功能的需求和强化,使武术攻防属性获得直接强化条件。除此之外,在宗法与准宗法组织中武术的封闭传承模式使武术攻防属性得到“精于一隅”的纵深发展。元代统治者风行雷厉的

“禁武”,使武术界存在的常态化擂台交流机制丧失<sup>[21]</sup>,而武术作为一种能够维护自身利益的特殊技能,自然就成“不可轻传之秘”,再根据宗法组织内向凝聚和向外相斥的特点,武术便囿于宗法组织或准宗法组织内部进行秘密传承。这种封闭性的传承机制缺乏与其他派别的习武者横向交流的机会,只能根据自身的条件和对身体攻防的不同理解,沿着他们各自侧重的方向纵深发展。形成诸如“山东李半天之腿、鹰爪王之拿、千跌张之跌”<sup>[22]</sup>等精于一隅的技术,“以柔克刚太极拳、倚型喻势螳螂拳、动迅静定查滑拳”等各具特色的拳种。

综上所述,在稳定的传统社会文化环境中,武术攻防属性围绕现实需求和传统文化得到不断强化,这个过程并没有借用其他地域、国家和民族的文化,而是独立的发明和发现。“发现”是指“将过去不为人所了解的事物变得人所知的行动,而“发明”则是对先前存在的材料、条件和风俗的新综合”<sup>[23]</sup>。武者对先前不为人知的身体攻防技术的纵深探索就属于“发现”,而诸如象形拳此类拳术,巧妙地将动物和醉汉等本来与武术毫无关系的动作与武术结合在一起<sup>[23]</sup>,这正是文化内部发展变迁中的“发明”,使二者在空间上和心理形象上进行了融合。

### 3 天崩地裂:武术攻防属性的弱化

关于宇宙空间的历史时间的知识,就是古代思想的基础<sup>[24]</sup>,而系统、精确和实用的西方科学知识很难像西方的伦理道德观念一样被解释、转化、并纳入传统知识体系中,成了渗透和瓦解中国传统知识、思想和信仰世界的契机<sup>[63]</sup>。西洋天学的传入使中国古代的士人产生了强烈心理震撼,舶来的西方文化打破了稳定的传统社会文化环境,而“在一个‘失去平衡’的系统中,会比一个比较整合的系统更可能发生借用”<sup>[65]</sup>。

“天崩地裂”后,列强侵略、国民羸弱,被“钢枪火炮”打败的“武术”转身奔赴“强健国民身体、培养尚武精神”的战场,武术被融入西方体育元素,在借用西方体育文化过程中,武术攻防属性被弱化。

#### 3.1 坚船利炮的威胁,打破武术攻防属性的原生环境

“坚船利炮”对“刀枪剑戟”似摧枯拉朽,西方国家用武力打开中国封闭的国门,也打破传统社会文化环境的稳定格局。鸦片战争以降,清廷掀起了一股仿造船炮的热潮,这是“中国最初所表现出来学习西方的意向<sup>[33]</sup>”,在借用西方知识文化、科学技术的同时也促使中国社会的变迁。

“变迁”孕育“变迁”,文化系统中的某一部分变迁都可能会导致其他部分的相应变迁<sup>[34]</sup>。“钢枪火炮的

出现,使武术技击失去了国家的支持,对技击能力造成了一定的影响”<sup>[25]</sup>。“武举制”在1901年被正式废止,军事武艺在战场上仅蜷缩于“短兵相接之时的五尺之地”,民间习武者通过“武举制”封官加爵的途径被切断,此时武术的“技击”特征被淡化,武术攻防属性较之“天圆地方”时期呈现出弱化的特征。当发展中的群体开始获得一个较现代化生活方式的基本东西时,他们总是接受一系列的技术而不是一个孤立的文化特质<sup>[37]</sup>,坚船利炮也让中国看到了西方军事人才的培养体系。例如,“北洋水师学堂以西式的课程内容为主,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武术的开展”<sup>[29]</sup>。但是,随着甲午海战北洋水师的覆灭,清政府意识到仅凭借“坚船利炮”不足以在战争中获得胜利,拥有意志坚强、能征善战的士兵才更为重要<sup>[66]</sup>。因此,旨在培养国民“尚武精神”的“中华新武术”应运而生。“中华新武术”是从庞大的传统武术体系中挑选具有代表性的套路,对传统套路的结构进行了大胆改革,归博到约,化繁为简,编成武术操,形成较系统军事训练教材<sup>[27]</sup>,较之传统武术更加适用于军队、学校以及社会的集体学习和操练。

“中华新武术”这种标准化武术形式,不仅借用西方体育元素,也将丰富、多元且具备个人和地域文化特色的“身体攻防”动作进行了裁减,使武术攻防属性中的传统文化内涵失去一部分载体。这种以“技击”为支持背景,以“传统文化”为理论支撑,通过“身体攻防”表现出来的身体文化被逐渐弱化。

#### 3.2 文化模式的革新,改变武术攻防属性的价值功用

“在西方坚船利炮威胁下,中国为了生存放弃了文明评价上的独自立场,也放弃文化与价值上的传统观念。中国人开始从以伦理道德为中心的文明优劣观转变到以强弱为中心的文明优劣观。”<sup>[63]</sup>“鸦片战争”就犹如一场“外科手术”,将“自强”和“求富”移植到中国人的心中,如何富强成为国之所向。梁启超认为:“立国者苟无尚武之国民,铁血之主义,则虽有文明,虽有智识,虽有众民,虽有广士,必无以自立于竞争剧烈之舞台”。为使中国摆脱殖民困境,改变羸弱窘境,武术与科技、教育等领域一同肩负起挽救民族危机的艰巨使命。

梁启超<sup>[28]</sup>认为:“我民族武德之斫丧,则自统一专制政体之行始矣。统一专制政体,务在使天下皆弱,唯一人独强,然后志乃得逞,故曰,一人为刚,万夫为柔。”在众民皆弱的古代,武术是武者行侠仗义的“利器”,其中承载着绝不忍受压迫、敢于反抗不公的精神。另外,拥有强悍的身体、心理素质是技击的基本条件,提倡国民习武能够振奋已经萎靡低落的民族士气。但

是,诞生于传统社会的武术携带的“污垢淤泥”限制了自身价值的发挥,亟须改变其中不符合新时代语境的文化特质,剔除旧武术携带的“门派之见”“江湖习气”等诟病。于是,“精武体育会”“中央国术馆”等群众性武术团体应运而生。

这类武术团体的出现使武术的传承对象由师徒转向师生,此时武术主要价值是强健国民体魄、振奋民族精神,使之拥有不惧西洋压迫,能与之竞争、抗衡的坚毅心理,以满足“强种强国”的迫切需求。而近代的时代特征就如奔雷闪电似地追赶世界的脚步,武术的班级授课也使“十年磨一剑”变成“照葫芦画瓢”,所教授的武术内容难以深入到武术攻防属性的核心层次。武术功用价值、生存空间发生转变的同时,身体攻防蕴含的传统文化内涵正在逐渐丧失所能依附的载体。另外,“土洋体育之争”促使的“武术科学化”,导致武术开始借用近代西方的生理学、力学等方法对“身体攻防”进行重新解释和改造,此时作为武术攻防属性表现形式的“身体攻防”开始转向以“强健体魄,振奋精神”为支持背景,以西方自然科学知识为理论支撑,武术攻防属性在如此境遇之下不得被弱化。

### 3.3 传统模式的阻滞,维系武术攻防属性的弱化状态

武术攻防属性开始弱化,而非隐匿、消失,正是由于传统文化模式的阻滞使得旧文化模式与新文化模式并存,维系了武术攻防属性的弱化状态。当一种新方法抑或文化出现在人们视野中,传统观念使他们不能立即舍弃原有的工具或文化。

由于传统文化模式的阻滞,在武术向体育领域转型过程中,一部分人认为作为“国粹”的武术,在面对西方体育文化挑战时应该被极力维护,从而巩固、平衡已经被动摇的传统社会文化环境;另一部分人认为提倡武术是在“开倒车”,并质疑武术是否具备社会发展的价值需要。这两种囿于极端文化立场而产生的偏颇之论,导致武术在不同人群、地域中一边被剥离出传统形态,一边还维持着原来的内容和模式。在民间,也有武者以技击为目的,按照传统武术原来的传承模式、内容以及体系进行习练和传承。在军事上,孙中山先生强调:“自火器输入中国之后,国人多弃体育之技击术而不讲,驯至社会个人积弱愈甚,不知最后五分钟之决胜,常在面前五尺地短兵相接之时”<sup>[29]</sup>。体育方面,“强毅国民”“增进健康”已经成为此时习练武术的主要目的,但在中央国术馆举办的“全国国术考试”中还包括“两两相当”的徒手、器械的对抗比赛<sup>[9]112</sup>,在1923年马良等人发起的“中华全国武术大会”中,竞赛内容“有体现攻防技击的率角和拳术、器械的套路单练和对练”<sup>[9]117</sup>。这表明“技击”仍然没

有彻底泯灭。

综上所述,传统的知识、思想和信仰的基石——“天圆地方”的宇宙观崩裂后,武术不再以技击为主要目的,生存领域开始从军事转向体育,失去了武术和武术攻防属性诞生、发展的传统社会文化环境,将原有的身体攻防内容进行标准化以及体育化改造。尽管,传统文化模式的阻滞导致的文化重叠减缓了武术攻防属性的弱化进程。但是,“随着西方文化在中国社会地位的不断提升,在‘赛先生’和‘德先生’越来越成为主流意识形态的情境中,中国传统武术在这场‘土洋体育论争’中无奈地走进了另一种境遇和另一种天地”<sup>[30]</sup>,西风鼓荡之下,武术攻防属性被弱化是必然趋势。

## 4 开天辟地:武术攻防属性的隐藏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经过28年的艰苦奋斗,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紧密融合,为中国的知识、思想和信仰奠定新的基石,国家的独立自主也使得文化主体性有了依托,新中国的成立可以称之为“开天辟地”。新中国成立后,“必须使广大工农群众,更好地劳动、发展生产,保证国家经济的不断增长。这就需要人民具有健康的身体、坚强的体魄和社会主义的优良品质,要求体育工作必须积极地为国家总路线服务”<sup>[31]12</sup>。对于武术的发展而言,如何服务国家发展的总路线成为新时代命题。在这个阶段,武术攻防属性的变迁是主动和有目的地介入西方体育文化的过程。

### 4.1 国家生产对人民健康的需求,边缘武术攻防属性的技击功能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的身体健康对社会生产和促进国家综合实力提升具有时代意义。武术作为民族传统体育具有强身健体的价值功用,所以“中央体育拟设专门机构着手研究和整理,以便正确地推广和提倡”<sup>[31]8</sup>。但是,“一些武术团体随意建立,有的搞封建迷信活动,还有甚者被反革命分子利用”<sup>[32]6</sup>。为此,中央体委党组指出:“关于武术,当前只能进行一些整理和研究工作,提出可以推行的项目,剔除那些对健康有害的,违反科学原理的、封建迷信的东西”<sup>[31]24</sup>,自此,对武术活动开始“收缩整顿”。1956年刘少奇副主席指出:“要加强研究,改革武术、气功等我国的传统项目”<sup>[32]7</sup>。

目的是行动的先导,此时武术的主要价值是促进人民身体健康,所以选择合适的内容、方法进行普及是促进大众身强体健的前提条件。因为技击是武术“演法、练法、打法”逐步进阶的最后环节,所以技击内容反而成为普及工作的一种“累赘”。但是,不涉及技

击内容的武术就失去了理解武术攻防属性这种身体文化的语境,武术中的身体攻防就成了一种无法验证的“假设”。长此以往,就会出现两种结果:第一种为“彼不知”,即“身体攻防”通过习练者的身体活动表现出来,但是身体攻防的含义、意识包括支撑身体攻防的文化内涵隐藏在习练者心中,习练者之外的人则无法察觉;第二种为“己不知”,即习练者自身也不知道技术动作的攻防含义,只是按照武术套路规定的动作路线进行模仿,而非有意识地将攻防含义对象化为身体活动,此时武术攻防属性被自己的“无知”所掩盖。

或许,有人认为武术套路中“拳、掌、勾、肘、腿、膝”的攻防演绎非常明显,何谈武术攻防属性之隐藏?武术攻防属性经过几千年“灵与肉”的实践和积累并非简单的几种拳脚动作,精妙、圆曲的“身体攻防”失去了文化内涵和技击拳理后,只不过是缭乱复杂的身体活动罢了。

#### 4.2 国际交流对武术竞赛的需求,促进武术身体攻防的夸张化

1953年11月17日,中央体委党组《关于加强人民体育运动工作的报告》提出:“我国的运动成绩虽然稍有提高,但离国际水平很远,因此在历次国际体育活动中皆形成我国体育运动水平与我国国家地位不相称的情形。”<sup>[317]</sup>通过参加国际体育竞赛可以彰显国家综合实力,而武术作为中华民族传统体育项目,走向国际舞台能够增强中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

武术与西方体育文化主动融合,以体操作为模仿范本,确定了“难度大、质量高、形象美”的发展方向。追求“美”的竞技武术套路不仅具备“己不知”和“彼不知”两种攻防属性隐藏模式,而且“艺术化”的表现形式还会增强隐藏的程度。竞技武术演练者放大身体攻防中的“开合”“虚实”“刚柔”等矛盾变化,将“弧线”扩充,“直线”拉长,并在“拳势”之间增加难度动作,形成巨大的视觉张力对观众心理产生美的极致冲击。而武术攻防属性以技击为支持背景,注重身体攻防之间的矛盾之小,尽量缩短攻击与防守之间的转换时间,以求“致人而不致于人”。所以,夸张化演绎的身体攻防与追求“打”的身体攻防在技术表现和文化内涵方面呈现出相悖的特点。所以,在竞技武术对身体攻防进行夸张化演绎的同时,“艺术性”掩盖“身体攻防”的最初文本意义,人们失去了理解武术攻防属性的传统文化语境和技击背景,武术攻防属性被隐藏起来。

“1989年正式颁布实施《武术散手竞赛规则》,全国散手比赛也同时正式登台亮相”<sup>[9126]</sup>,武术散打是中国武术与西方拳击在中国大地上交融产生的新文

化。武术散打经过几十年的竞赛发展,已经形成属于自己的身体攻防技术体系,并且有新的思想和战略指导身体攻防活动,较之武术传统的身体攻防更适用于擂台竞赛,但无法表现出传统武术的攻防应用,这也是武术攻防属性隐藏的一种形式。

#### 4.3 “文革”期间对传统文化的破坏,加速武术攻防属性的隐藏过程

“文革”期间,武术活动基本被禁止<sup>[32117-118]</sup>,“武术不准谈‘技击’‘劲力’‘攻防方法’,只进行表演性质的武术套路竞赛”<sup>[33]</sup>,加速了武术表演性质的发展及其艺术化进程。

武术为从“四旧”中走出去获得“自由之身”,于是出现“语录拳”“样板武术”等符合特殊文化环境的新编套路,并且得到当时国家体委部分领导的高度赞赏:“武术套路中有2/3的时间在空中做动作,十分精彩,希望能够大力推广”<sup>[32120]</sup>,大力倡导表演性质的武术套路促进了武术艺术化的进程。从竞技武术套路的竞赛规则看,“文革”期间对竞技武术套路规则增加“动作难度”的加分项,这是武术套路中身体攻防元素的减少、高难度技巧元素增多的开端。“文革”期间,作为支持背景的技击和作为理论支撑的传统文化都被“消灭”,即使身体攻防动作还存在于套路之中,但剩下的只是一具没有传统文化内涵和攻防含义的“躯壳”。

这背后的原因正是葛兆光<sup>[34]</sup>所提到:“人们对于历史记忆大多有两种取向,第一种是回溯本原。另一种却是斩草除根,以发掘历史记忆的方式反省自身传统的来源,并把这种连累自己的根挖出来并彻底斩断。”武术攻防属性属于传统社会文化时期的产物,因此就必须将其放在批判的位置上,给“竞技武术”这种新事物腾出发展的空间并凸显时代的位置。

综上所述,新中国成立后,为了服务国家生产建设和促进国际交流,突出发展武术的健身和艺术价值,重视身体攻防的艺术和规则的和谐,造成了武术攻防属性的隐藏。

## 5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武术发展的反思

武术攻防属性的演变,实则是由社会文化环境的变迁催生的一种反应和创新需求,其强化、弱化以及隐藏是为适应当时的社会文化环境。但是,“当那个社会环境极其复杂、各种矛盾交织在一起的特殊阶段过去之后,如果还不拨乱反正,回过头来解决因矫枉过正带来的诸多问题,将会出现极其严重的后果”<sup>[35]</sup>,而中国式现代化是武术拨乱反正的重要契机。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sup>[36]</sup>武术攻防属性是由“传统文化”与“身体

攻防”交织构建的,所以武术现代化发展应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立足于武术攻防属性。

### 5.1 坚定文化的自觉、自信、自强和自立,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竞技武术虽然表面“挂满”中华传统文化符号,却无法充分彰显传统文化的内涵。所以,武术的现代化发展必须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坚定文化自信、自信,“尊重历史,不断地汲取前人的成果是继承发扬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途径”<sup>[37]</sup>。武术攻防属性作为“传统文化”与“身体攻防”的交织,是中国武术的核心内容,中国武术发展根植于优秀传统文化,就要让被现代性和艺术性掩盖的武术攻防属性重焕光彩,让优秀传统文化不仅仅作为一种抽象的概念定格在历史书籍上,还要使它成为一种具体的行为方式活跃在日常生活中,使武术成为优秀传统文化的鲜活载体。

坚定文化自信、自信,将武术发展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非单纯的复古之举或重复古人,而是从历史资源中汲取营养,将其纳入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加以改造,凸显武术的民族性和中国特色,从而实现文化自强。在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营养的同时,对武术的知识思想、技术方法置于优秀传统文化语境之中进行溯源,做到“知其然,知其所以然”,摒弃“自古以来”这样的字眼,代替武术蕴含的中国知识文化和哲学思想。“这要求我们认识传统武术发展演变至今的规律,主动对传统武术的演变过程进行反思,尤其是对传统武术的渊源、发展、未来及其新时代的作用和地位等有清醒认识,并主动承担起传统武术新时代发展的历史责任和使命担当”<sup>[38]</sup>。

### 5.2 挣脱西方体育束缚,确立以我为主的武术发展方向

西学东渐以降,武术一直被置于体育领域发展,在向“奥运会”进军的同时,中国武术的传统文化内涵被逐渐消解,这是否令我们嗅到一丝阴谋的味道?美国针对中国的《十条诫令》,其中包括“利用所有资源,甚至举手投足,一言一笑,破坏他们的传统价值,让他们向往我们的衣、食、住、行、娱乐和教育的方式”。“文化战争”没有硝烟,能够使人在不知不觉中失去对民族文化的认同,河清<sup>[39]</sup>在《艺术的阴谋》中提到:“艺术是文化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文化战争的先锋”,而武术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载体<sup>[40]</sup>,也是中国文化的子系统<sup>[41]</sup>,对武术的阴谋,也是针对中国文化的阴谋。在武术“入奥”屡次被拒后,我们按照西方竞技体育的标准对其进行改革,武术蕴含的传统文化被西方竞技体育文化代替,历史根基、文化自信和主体地位逐渐模糊。

武术想要与各民族体育交相辉映,就必须挣脱西

方体育束缚,确立发展的主体性。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打破西方现代化话语霸权,开启人类文明话语共生共存、平等交流的新时代<sup>[42]</sup>,也表明武术发展应该与西方竞技体育平等交流,摒弃过度模仿和复制。当然,这并不是说武术不应该进入“奥运会”,正如邱丕相<sup>[43]</sup>所言:“我们要讨论的不是武术该不该进的问题,而是应当如何进的一个问题。”显然,将传统武术的身体攻防动作进行拆解,然后再按照西方竞技模式进行改造、组装是削足适履的一种做法,在兼顾武术“民族性”和“时代性”的问题上,无法提交令人满意的答案。

武术攻防属性作为武术的核心内容,其弱化和隐藏,也是武术民族性、文化主体性的弱化和隐藏。摆脱西方体育的束缚,确立以我为主的主体地位,就要将武术攻防属性作为武术未来发展的基础,将西方体育文化融入进来,为“我”所用,将“中国式现代化”作为衡量武术发展的“标尺”,兼顾“民族性”和“时代性”,站在中国文化和中华民族的立场去观察、选择以及吸收世界各民族的优秀体育文化。

### 5.3 创新武术发展模式,汲取世界各民族体育文化的有益因子

挣脱西方体育的束缚,将武术发展根植于优秀传统文化之上,并非“唯我独尊”,其目的是站在中国文化和中华民族的立场上去观察、选择以及吸收世界各民族体育文化的有益因子,创新武术发展模式满足日益多元的现实需求。

西学东渐以降,武术发展依赖于西方体育路径,而反观邻邦日本,“剑道无意进入奥运会,致力于通过剑的原理和方法的修炼,形成高尚的人格”<sup>[35]</sup>。武术发展既要学习不为“西风”所动的魄力,也要学会“通变”。“所谓通变,通是第一位的,变是第二位的。那种割裂传统与现代、将古今对立起来的思维方式是‘不通’的”<sup>[39][27]</sup>。武术在以“我”为主的基础上吸收竞技体育文化发展的“太极推手”和“长、短兵”之类对抗性竞技体育项目,无疑是中国武术与西方竞技体育文化的互相成就。在长、短兵中“致人而不致于人”的战术思想,太极推手中“沾粘连随”“接引发放”的技法,都蕴含中国传统文化内涵和古典哲学思想。另外,当今武术的发展模式“更多集中于技术的生产、传播、消费,忽视了技术背后的文化意义,以及文化意义的生产和消费”<sup>[44]</sup>,所以武术发展创新还要重视文化传承和精神教育价值,阐释技术背后的文化内涵,兼顾“民族性”和“时代性”。

中国武术在创新发展模式的同时,不仅要确保文化主体地位,还要有源源不断营养供给。旁观同样具

备攻防属性的篮球运动,即使具有“花样篮球”“花式扣篮”等多种形式,但是篮球运动还是以常规的实战比赛为主流,不断进行篮球技术、文化的生产,而其他形式的篮球运动可以从常规实战比赛中汲取源源不断营养。传统武术的各个拳种和技击环节可以通过围绕武术攻防属性,贯穿各环节建构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武术生态系统,满足竞技之需、健身之需、教育之需、文化之需等。所以,亟须建立能够彰显民族性和传统文化内涵的攻防格斗类武术项目为主导,同时“我们需要一个完完全全地属于中国人自己的本土体育运动会”<sup>[37]</sup>,将武术的发展根植于中国文化和中华民族,面向世界和未来,为人类体育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体育的智慧。

从武术攻防属性演变进程中,可以见证中国人的身体智慧以及中国文化的与时俱进,从“天下”到“万国”,武术经历由“技”致“道”的升华,也完成从“暴力”到“艺术”的场域超越。诞生于几千年前的武术没有被历史发展的滚滚洪流所吞没,而是不断变换形态为人类发展贡献其多元价值,彰显武术在面对未来社会文化环境时能够发挥价值的实力与自信。但是,在武术匆忙走向世界迎合时代发展的同时,武术攻防属性没有得到充分表达,武术没有在多元形式中彰显民族性和中国特色。因此,在中国式现代化打破西方现代化话语霸权的时空背景之下,应以武术攻防属性为武术未来发展的核心内容,凭籍武术攻防属性的演变规律,来探究武术可持续性发展。武术在国际化发展中必须得到本体建构,彰显民族性,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攻防格斗类项目,不断进行技术和文化的生产,为武术的多元化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营养。

### 参考文献:

- [1] 李泽厚. 走我自己的路[M]. 北京:三联书店, 1986: 10.
- [2] 刘文武. 武术基本理论问题反思[J]. 体育科学, 2015, 35(3): 20-29.
- [3] 张岱年, 方克立. 中国文化概论(修订本)[M].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
- [4] 夏征农, 陈至立. 大辞海: 政治学·社会学卷[M].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 2010: 579.
- [5] 克莱德·伍兹. 文化变迁[M]. 施惟达, 胡华生, 译. 昆明: 云南教育出版社, 1989.
- [6] 葛兆光. 中国思想史: 七世纪至十九世纪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1.
- [7] 葛兆光. 中国思想史: 导论[M]. 上海: 复旦大学

出版社, 2001.

- [8] 徐行言. 中西文化比较[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336.
- [9] 周伟良. 中国武术史[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3.
- [10] 李良根, 李琳. 剑经注解[M]. 南昌: 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2: 3.
- [11] 李亦畲. 王宗岳太极拳论[M]. 北京: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6: 125.
- [12] 徐震. 苕氏武技书[M]. 上海: 上海书店, 1990: 1-8.
- [13] 陈鑫. 陈氏太极拳图说[M]. 太原: 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6: 1-46.
- [14] 江百龙, 林鑫海. 明清武术古籍拳学论析[M]. 北京: 人民体育出版社, 2008: 14.
- [15] 张再林. 中国文化的大传统与小传统关系的哲学辨析[N]. 光明日报, 2019-01-28(15).
- [16] 程大力. 中国武术: 历史与文化[M].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1995.
- [17] 左丘明. 国语[M]. 呼和浩特: 远方出版社, 2006.
- [18] 姚伟钧. 宗法制度的兴亡及其对中国社会的影响[J].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2(3): 87-92.
- [19] 罗庆泗. 明清福建沿海的宗族械斗[J]. 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0(1): 107-112.
- [20] 万籁声. 武术汇宗[M]. 北京: 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 2014: 4.
- [21] 杨建营. 武术拳种的历史形成及体系化传承研究[J]. 体育科学, 2018, 38(1): 34-41.
- [22] 戚继光. 纪效新书[M]. 北京: 人民体育出版社, 1988: 308.
- [23] 任海. 中国古代武术[M]. 北京: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2011: 94.
- [24] 葛兆光. 知识史与思想史 思想史的写法之二[J]. 读书, 1998(2): 133-141.
- [25] 周雨芄, 杨建营. 传统武术技击的弱化历程及提升途径[J]. 体育学刊, 2019, 26(6): 41-45.
- [26] 李印东. 中华武术通史. 第三卷, 清末至民国[M]. 北京: 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 2021: 29, 76.
- [27] 邱丕相, 吉灿忠, 闻一鸣. “追美挥欧”式“中华新武术”的是与非[J]. 上海体育学院学报, 2011, 35(5): 61-63.
- [28] 梁启超. 新评中国之武士道[M]. 长春: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08: 2.
- [29] 杨祥全. 中国武术思想史[M]. 太原: 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7: 299.

- [30] 赵连文, 朱雄, 王岗. 中国武术现代化的历史回眸与新时代发展论略[J]. 沈阳体育学院学报, 2019, 38(4): 130-137.
- [31] 国家体委政策研究室. 体育运动文件选编[M]. 北京: 人民体育出版社, 1982.
- [32] 杨祥全, 李英奎. 中华武术通史. 第4卷[M]. 北京: 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 2021.
- [33] 武冬. 中华武术通史. 第五卷[M]. 北京: 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 2021: 24.
- [34] 葛兆光. 历史记忆、思想资源与重新诠释——关于思想史写法的思考之一[J]. 中国哲学史, 2001(1): 45-53.
- [35] 杨建营. 以“扣子论”为切入点的新时代中华武术发展改革定位[J]. 北京体育大学学报, 2021, 44(1): 145-156.
- [36] 邝西曦, 董丝雨. 正确理解和大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N]. 人民日报, 2023-02-12(001).
- [37] 马明达. 试论中国民族体育体系的重构[J]. 体育文化导刊, 2007(6): 21-27.
- [38] 马廉祯. 传统武术价值体系亟待重构——由徐晓冬事件引发的若干思考[J]. 体育学刊, 2018, 25(5): 25-29.
- [39] 河清. 艺术的阴谋[M].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2.
- [40] 邱丕相, 马文国. 关于中国武术发展战略的几点思考[J]. 西安体育学院学报, 2005, 37(6): 1-3+7.
- [41] 王岗, 吴松. 中国武术: 一种理想化的技击艺术[J]. 体育文化导刊, 2007(2): 21-23.
- [42] 陈月. 从大历史观看中国共产党领导意识形态建设的实践与经验[J]. 思想教育研究, 2023(7): 65-70.
- [43] 邱丕相. 中国武术文化散论[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8.
- [44] 戴国斌. 中国武术的文化生产[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5.

